

19

革命回忆录

战斗的岁月

张宗逊

抗战胜利后的中共驻

南京、上海办事处

钱之光

柳亚子在皖南事变

前后

萧林晖

天津战役

刘 铸

革命回忆录

(第十九辑)

人 民 出 版 社

期 限 表

请于下列日期前将书还回

革 命 回 忆 录

GEMING HUIYILU

(19)

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787 × 1092 毫米 32 开本 6125 印张 140,000 字

1986 年 2 月第 1 版 198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7,600

书号 11001·789

定价 0.95 元

2553/14

《革命回忆录》丛书编辑例言

为了收集、积累、保存有关中共党史资料，以满足党史研究和教学的需要，特编辑革命回忆录丛书，分册陆续出版。

本丛书内容包括老党员、老干部和老红军所写的回忆录，党的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及革命斗争亲身经历者的访问记，以及革命烈士的传略和纪念文章等，仅供参考。

《革命回忆录》上刊载的文章，力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符合历史本来面目。但因个人的记忆难免有误差，难免有不详尽之处。如有某些事实有误或有不同的见解，欢迎提出订正、补充。并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 回忆录 •

战斗的岁月	张宗逊(1)
抗战胜利后的中共南京和上海办事处	钱之光(62)
平西风云	金振中(140)
——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简况	
保定天主教徒对抗战的贡献	费国柱(157)
天津战役	刘 铸(167)

• 人物轶事 •

张闻天的青年时代	李敬永(179)
柳亚子在皖南事变前后	萧林晖(183)

战斗的岁月

张宗逊

在赤水团的特别支部

我于一九〇八年二月七日出生在陕西渭南赤水镇堰头村，从七岁开始在本村念私塾。到了一九一九年，我的叔父张浩如从广东韶关的云南讲武堂毕业回乡，在赤水镇法济寺小学当教师，我便跟他到这所小学读书。张浩如发扬“五四”精神，提倡白话文，用新法教学，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一九二〇年的五月九日，学校举行了一次“国耻纪念”活动，张浩如带领全校师生，到赤水街上游行，大家手持写有反帝、爱国口号的三角小旗，沿途高呼“反对媚外军阀”、“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口号。这件事轰动了赤水镇，一时在群众中广为传诵。

一九二二年七月，王尚德同志受董必武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委派，由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回乡，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团的组织。王尚德同志是赤水镇人，于一九二一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最早期的团员之一，曾与

本文作者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现离休。

恽代英、萧楚女、林育南、李求实等同志一起，创办了互助社、利群书社等组织。不久，我的胞兄张宗适也从董必武任校长的武汉中学读书回乡度暑假，共同介绍张浩如和刘建侯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这一年，王尚德和张浩如集资，在法济寺小学的基础上创办了赤水职业学校，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我也转到该校读书，是第一班的学生，全班共十六人。王尚德和张浩如对我们这一班很重视。他们向学生讲解了不少革命知识，如阶级斗争和社会进化史、近代史，还定期报告时事；并指导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和《向导》、《中国青年》、《新青年》等党、团机关报刊的重要文章，给学生很大影响。

一九二四年春，刘建侯从临潼三育学校转到赤水职业学校任教以后，才正式成立赤水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由王尚德任支部书记，张浩如任宣传委员，刘建侯任组织委员。这是陕西省最早的一个团支部，是直属上海团中央领导的特别支部。这年五月，团支部开始在赤水职业学校的学生中发展团员，我是第一批加入青年团的学生之一。当时我十六岁。

在团的特别支部成立前后，曾组织开展了各种活动。例如组织平民夜校，建立农会，支持渭南十万农民抗捐抗税斗争；在教育界组织了教育促进会、三民主义研究会，以及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等活动。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王尚德又组织赤水职业学校和渭华一带的中小学校师生及各界群众，召开追悼大会。同一期间，组织渭南群众参加、配合了国民二军驱逐直系军阀刘镇华（陕西省长兼督军）

及吴新田(继任督军)的斗争。这一年发生五卅惨案,王尚德又领导赤水职业学校师生参加“沪案”后援会,抗议帝国主义惨杀中国工人的暴行,募捐支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

一九二五年,王尚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共青团中央和中共豫陕区委派吴化之来陕整顿团组织和筹建党组织。吴化之曾到赤水指导工作,使赤水团组织得到加强,并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王尚德改任党的特支书记,由张宗适接任团的特支书记。

当时正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中央决定:为使国民党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凡是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可为之建立,中共党员和团员在国民党组织内起骨干作用。一九二五年九月,中共党组织在渭华一带帮助国民党组建了党部,我也根据组织决定加入了国民党。

自一九二四年以后,赤水职业学校的教员多为中共党员、团员与进步人士。到过赤水职业学校工作的中共早期党员不少,据我所知,其中有武止戈、王复生、王懋廷、吴化之、耿炳光、方千才(方仲如)、张兆丰(国民三军团长)、潘自力、张秉仁、高克林等。赤水党团特别支部的许多同志后来都成了陕西党团组织的骨干,由于他们进行的革命活动,使渭华地区成为大革命时期陕西农民运动高涨的地区之一,为后来爆发党领导的震动西北的渭华起义打下了基础。

进入黄埔军校 参加北伐战争

一九二五年冬，中共中央通告各地党组织，选派党、团员到广东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赤水团的特别支部决定派我同姚俊明前去。

一九二六年一月，我们怀着学好本领献身革命的热切愿望从家乡出发，同行的有苏士杰（中共党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牺牲于新疆）等四人。经由河南到上海。找到团中央，办好去黄埔军校的团组织介绍信，于二月上旬才抵达广州黄埔港。我到黄埔军校报到后，被编入第五期入伍生二团二营五连。

黄埔军校只有党的组织，没有青年团组织。我一到黄埔军校，党组织即通知我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五连学员中有中共党员五人，即余陶、廖昆、葛志坚、姚俊明和我，小组长是余陶，由他和上级联系，那时忙于操课，党小组没有其他活动。大约每两周去一次广州市东较场的广东省农民协会，听周恩来同志的政治形势报告，每次听报告的党员约有百余人。周恩来当时是粤区军事部负责人，他讲话条理清楚，深入浅出，很有说服力，同志们都爱听。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策划了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阴谋排挤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事变后，在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不再保留双重党籍，并向国民党公开。我当即在军校发的表格上签名退出国民党，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完全没有想到，这次共产党员公开身份的结果，让蒋介

石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屠杀黄埔军校中共党员获得了一份名单。由于后来我随政治科到了武汉，才避过了那场惨祸。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这时，入伍生部抽出部分学员组建了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工兵营，开赴前方参加北伐战争；其余入伍生均调往东江，担任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我们二团二营负责东莞、石龙的防务。当时正处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以后，英帝国主义支持的武装土匪在广东沿海一带到处骚扰破坏，斗争异常尖锐，我们担负的巡逻、警戒和搜捕任务相当繁重。我在东莞执勤期间，有一天突然接到王尚德从军校校本部寄来的一封信，说他同陕北的白明善和华县的陈述善来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工作。我见信后非常高兴，立即请假到校本部看望离别半年的王尚德老师。原来，一九二六年春，国民二军在河南失败，刘镇华率十万匪军再次入陕，围攻西安，在渭华地区通缉王尚德等共产党人。王尚德等只得化装离陕，几经周折，与恽代英取得联系，调到黄埔军校工作。

我升入本科后，经过考试，被编入第四期政治科二队。在这期间，国民革命军在北伐前线节节胜利，十月占领武汉，十一月占领南昌。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声势浩大，工农群众积极参战，不少旧军阀部队也迫于形势，易帜拥护国民革命军。由于国民革命军迅速扩大，前线急需大批政治干部，北伐军总政治部命令黄埔军校政治科调往武汉分校政治科。我和政治科全体人员一起，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出发到达武汉后，即刻投入正式军政训练。

武汉分校的政治科目，增设了有关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的内容,政治教员有恽代英、张秋人、施存统、沈雁冰等。张国焘在武昌的一所小学里为分校的中共党员作过两次形势报告。

一九二七年四月中旬,我们原黄埔四期的两个队,即政治科的第一队和我所在的第二队毕业了。

武汉“七·一五”政变前后

我毕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三师(师长李云杰)第九团(团长周希武)的团政治指导员办公室,任干事兼第二营政治指导员。

当时,军事干部和政工人员分属两个系统,政工干部直属集团军政治部领导,团以上单位的政工人员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少数是国民党左派,营连政治指导员大部分是国民党左派,三师的政治部主任王文海,九团政治指导员张天一,都是中共党员。九团指导员办公室只有张天一和我两个人,全团也只有我和他二人是中共党员,还有个共青团员刘一鸣。

我刚到九团工作不几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地相继发生了反革命的大屠杀。四月十五日,在广州黄埔军校 of 的中共党员几乎全部遇害。此时,湖南的革命形势正如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存在着“好得很”和“糟得很”,革命和反革命两种势力的斗争。我初到岳阳时,从表面上看,当地还有点革命气氛,还象个北伐军后方的样子。其实斗争已很激烈,土豪

劣绅、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愈来愈嚣张。随着武汉汪精卫政府日趋反动，陈独秀投降主义又步步退让，一个月以后，斗争便逐渐公开化了。

四月下旬，奉系军阀势力从河南威胁武汉，武汉政府组织第二次北伐，驻武汉的国民革命军大部开往河南与奉军作战。五月十七日，驻防在湖北宜昌、沙市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受蒋介石指使，率领所部叛变革命，乘武汉空虚之机，沿长江东下，经过八军九团的防区，向武昌进攻。我所在的九团二营营长涂卓，瞒着我在深夜秘密由城陵矶乘船与叛军联络，原来九团是有计划地配合夏斗寅行动的。但夏斗寅部的进攻，仅两天就被叶挺指挥的武汉卫戍部队和由武汉分校学生组编的独立师所粉碎了。

一个月后，驻长沙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的团长许克祥，于五月二十一日发动马日事变，释放了在押的土豪劣绅，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省委书记郭亮及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的许多领导人都被枪杀，长沙一带一片白色恐怖。马日事变后，岳阳的政治形势紧张了，驻岳阳的周希武部表面中立，但暗中却支持地方的反动势力。国民党岳阳县政府以各种借口逮捕共产党员，当地的中共党团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团体都被迫转入地下。在华容、南县、安乡地区的反动豪绅则支持许克祥叛乱，纷纷反攻倒算，恣意捕杀农民运动积极分子。这个地区许多农运干部经岳阳向武汉转移，如农协总指挥欧阳健、何长工、杨运北、蔡协民等都是经岳阳走的。也有不少同志路经岳阳时，在旅馆被反动县政府公开逮捕。

这时，九团政治指导员张天一也离开岳阳到武汉躲避，第

四集团军总政治部任命我代理团政治指导员。在这种形势下，九团的政工人员无法开展工作，只好等待上级指示。

六月底，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取得胜利，北伐军主力在“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下由河南回师武汉，开往江西、安徽方向。同时，武汉政府以第二军谭延闿部和第六军程潜部为主力，第八军第三师配合，由程潜组织指挥西征军，进行鄂西战役，向夏斗寅残部和配合反革命叛乱的四川军阀杨森、贵州军阀陈渠珍等部反攻，岳阳的形势表面上有所缓和。九团政治指导员张天一从武汉回到部队，政工干部逐渐恢复了工作。九团奉命沿长江向西进攻，路经湖北的监利、石首、公安，因杨森、陈渠珍部从监利一直向四川、贵州撤退，沿途未与敌军发生战斗。七月十日前后，九团到达湖南的澧县、临澧地区，与第八军三师主力会合。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在武汉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七月十六日，三师政治部接到党中央自武汉通过有线电报局发来的密电，师政治部主任王文海向我们作了传达。电文的内容大意是：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国共合作最后破裂，中央要求共产党员除少数可继续留下做隐蔽工作的外，都陆续撤离国民党军队。听传达后，我由于曾在黄埔军校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是黄埔“四·一五”事变的幸存者，如继续隐蔽以后会有麻烦。我把自己的情况报告了王文海，王同意我迅速离开国民党军队，前往武汉找党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我于七月十七日离开国民党军队，二十日到达武汉，根据党组织通知，到设在武昌黄土坡的党中央的联络机关报到。

党组织根据我的要求，分配我到二十四师新兵训练处任中尉排长。

这个师的新兵训练处总共只有一个新兵营，新兵的成份多数是马日事变后逃到武汉的湖南农民和农运干部，杨立三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也在新兵营当排长。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面对大革命失败的严重形势，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挽救革命，由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我所在的二十四师新兵营编为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第三营，我任十连副连长。团长卢德铭是中共党员，黄埔二期毕业生。他已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警卫团迅速赶到南昌和二十四师会合。部队便于七月三十一日晚出发了。八月三日，到达阳新。这时传来贺龙、叶挺部队在南昌起义的消息，卢德铭同志即率领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到达江西奉新县时，侦察到南昌起义部队已向临川方向开去，同时发现赣江对岸樟树镇一带有敌人朱培德部队驻守，赣江不易通过。卢德铭估计已不可能追上起义部队了，决定放弃原定与贺、叶部会合的计划，由他和团政治指导员辛焕文、参谋长韩浚去武汉向中央请示部队下一步的行动，由一营营长余洒度代理团长，把部队带到修水县休整待命。余洒度也是中共党员，黄埔二期的毕业生。卢德铭走后，为了隐蔽目标，余洒度派人到南昌与朱培德交涉，把部队番号改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余洒度担任师长，警卫团编为第一团，我们十连连长

金文生担任三营长，我接任十连连长。

在修水，部队抓紧扩充兵员，并与平江农民自卫军余贲民部取得联系，将自卫军补编到第一团，余贲民任副师长。接着又与驻铜鼓县的浏阳农民义勇队苏先骏部取得联系，并将该部编为第三团，派警卫团第十一连连长伍中豪带该连去加强。后来，罗荣桓率领的鄂南农民自卫军一百多人也来到修水，编为师部特务连。

参加秋收起义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抛弃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彻底结束了他在中共中央的领导，确定了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革命基础好的省份，发动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武装起义。

“八七”会议后，在党的领导下，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各省相继举行工农武装的秋收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担任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决定卢德铭返回部队，担任起义部队总指挥。在他们没有赶回以前，“八七”会议的精神已传到部队，大家听到中央的指示都非常振奋，紧张地进行起义准备，迎接伟大革命风暴的到来。起义军编为一个师，师长是余洒度，由他负责组织起义的准备工作。警卫团和平江农民自卫军一部编为第一团，团长

钟文章；安源工人纠察队与安福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二团，团长王新亚；驻铜鼓县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加上平江农民自卫军和警卫团各一部组成第三团，团长苏先骏。此外，还收编了邱国轩部几百人，编为第四团。邱国轩原是夏斗寅的残部，夏部在武昌附近被击溃后，邱部流落到湖南平江县长寿街地区为匪，余洒度将其收编，以后这个团在湖南平江地区叛变。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震撼湘赣的秋收起义爆发了。在“攻打长沙”的口号下，师部率第一团由修水县出发，第二团由安源出发，第三团由铜鼓出发，以长沙为攻击目标，分途前进。

我所在的第一团分两个梯队由修水出发，团部率第二、三营为一梯队，九日从修水县出发；师部率一营为二梯队，晚一天出发。我所在的第三营出发后，第二天向平江县长寿街前进，部队进到长寿街附近的金坪，与第四团的邱国轩部联络时，却遭到了邱部的暗算，他派人送来假通报，说前方小河对岸发现有敌人，我即奉命率领十连，徒涉过河向前搜索，结果扑了个空。这时邱部却从两侧高地袭击我团部和本队，我军猝不及防，遭到很大损失。团长钟文章和三营营长金文生等一些军官有的失踪、有的跑散。九连打得很英勇，连长黄赞失踪，三营十二连和第二营都损失一部，团部的辎重和各单位行李、炊事用具全部损失了。原先收编邱国轩部时，我们没有派人进去做工作，只派了一个参谋作联络员，在邱部叛变时被杀害了，以致对邱部的动向事先一无所知，毫无防范，造成了失利。

邱国轩伏击时，我带领十连在前边搜索，所以我连战斗人员没有伤亡。当晚，我们收容了其他连的一些失散人员，第二

天与师部主力在龙门厂附近会合，部队就在那里进行了整编。卢德铭就任起义军总指挥，宣布起义部队的正式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把一团受损失的二、三两个营和其他失散人员合编为第一团第二营，我任第六连连长，何长工任六连党代表。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日上午，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全师集会，毛委员讲了话。他向部队传达了党中央召开“八七”会议的精神，并决定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在进军中担任后卫的三团突然遭到朱培德部和地主武装的袭击。在危急时刻，卢德铭带参谋胡景玉就近指挥，掩护部队转移，不幸中弹英勇牺牲，胡景玉也同时阵亡。卢德铭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一贯坚定地执行党交给的任务，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全军指战员都为他的牺牲感到悲伤和惋惜。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部队占领莲花县城，于九月二十八日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三湾是个小村子，只有十来户人家，座落在永新县西乡的山区。部队进驻以三湾村为中心的几个小村子里，毛泽东住在三湾村的一户农民家里。

秋收起义后，部队遭到几次挫折，战斗减员很大，加上长途行军转移，病员也很多，特别是当时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军心涣散。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三湾召开前委会，决定再次对部队进行整编，同时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